

# 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

## ——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

张 其 仔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的研究, 推敲了两个基本的问题, 一是检验了范德普尔的社会支持网发现法对于追溯我国村庄中农民的社会网络的适宜性, 二是检验了西方学者发现的弱网的力量对于农村社会非就业领域是否成立。此外, 它还对运用问卷发现农民社会网络的问题构成及提问程序进行了讨论。它的基本结论是, 范德普尔发现法只具有部分适宜性, 弱网的力量对于这个村庄来说并不成立, 在非就业领域起作用的是强网, 但这并不构成对弱网假说的否定。为了对此进行解释, 本文在综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 IS-TS 模型。它比起格兰洛维特的 IS 模型更具包容性, 能解释弱网的力量与强网的力量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发现。

### 一、引 言

美国著名的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洛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就业过程时发现, 当个人运用他们的个人网络找工作时, 他们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得到相匹配的工作(Mark Granovetter, 1973)。这个命题提出后, 不少的学者就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通过检验工人通过弱网找到的工作其工资和地位是否较高来验证弱网的力量这个假设(James D. Montgomery, 1994), 但发现是相当混合的(边燕杰, 1998[1997])。

中国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人十分重视关系的传统, 并就关系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倾注了极大的关怀, 但在不同关系类型的作用上, 他们所观察到的是与格兰洛维特的弱网的强力相反的现象。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结构进行了对比后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费孝通, 1998, 24-30), 所描述的不是弱网的强力, 而是强网的强力, 但在本书中他只是提出一种现象, 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证(孙立平, 1996)。台湾大学心理系的黄光国教授发展出的一个名为“人情与面子: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理论模式, 对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进行了区分, 其核心即在于, 中国人在进行交往时, 首先要判断关系的类型(黄光国, 1989, 6-7)如果把他的这个模式翻译成网络话语, 他所持的就是强网的力量观点, 但这些观点都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而在社会调查中, 无论是对企业管理与运

\* 我感谢《社会网络》主编 Liton C. Freeman 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生态学院的 Danching Ruan 博士, 他们为我提供了对本研究有用的资料与信息。这次调查我还得到了福建省晋江市委、市政府, 特别是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大力支持, 得到了西滨镇镇委、镇政府和跃进村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们就不能进行这项调查。龚维宾和张大伟先生参与了这次调查工作, 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的研究, 还是对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 都发现了社会关系的作用与意义(费孝通、张之毅, 1990, 98; 黄宗智, 1992, 94—116; 杨国枢, 1994; 郭于华, 1994; 孙治本, 1995; 李培林, 1996; 桂勇, 1997等), 只是所有的这些研究都不是针对弱网的力量这个命题而展开, 研究者在研究中虽然区分了不同的关系类型, 如亲缘、地缘、情缘、学缘等, 但并没有就这些关系类型的强度进行测量, 从而也就没有对网络强度的差异效应展开研究, 所以并不包含着与格兰洛维特弱网的强力这个假说的对话。从弱网的强力这个假说出发对中国大陆社会进行的首次研究, 是边燕杰对天津就业问题的研究, 这个研究超出了市场经济这个范围, 检验了当工作通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僚制来分配时弱网的力量, 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边燕杰, 1998[1997])。台湾地区的学者在80年代中期对台湾地区就业过程展开的类似研究, 同样发现了强网对于转业、离职的作用(熊瑞梅、孙清山, 1985; 熊瑞梅、孙清山、许志松, 1986)。

西方学者对弱网的力量研究立基于劳动力市场之上, 由此为出发点而展开的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同样局限在就业方面, 而与此没有关联的中国学者的关系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 而不仅仅是就业。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社会网络和经济生活的关系, 它秉承中国关系研究的传统, 超越就业的范围研究强网与弱网的影响, 利用1998年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的调查资料, 阐明不同强度的关系类型对办企业的影响, 以检验弱网或强网的力量对于就业之外的投资领域的适用性, 并就发现农民个人网络的方法进行探讨。

## 二、资料与方法

西方网络分析理论一般把概述个人网的方法分为四种, 即互动法、角色关系法、情感法和交换法。在概述个人实际支持网时这四种方法各有其优势和不足之处, 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概述个人网络, 但相对而言, 交换方法更为有效。所以, 范德普尔(Van der Pole, Mart, G. M.)以交换法为基础, 在1987年对荷兰进行全国性的初级关系和社会支持调查时构造了一个问卷。问卷涉及10个独特的支持性互动的提出人名问题。这些问题被分为三个支持的方面: “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等, 一共由10个问题组成。对于这10个问题, 允许回答者最多提出5个人名。如果提出的人名多于5个, 则提出最重要的5个人名。当支持网的所有成员确认后, 要求回答者指出他或她与这些人的角色关系(Van de Poel, Mart, G. M., 1993)。

作为出发点, 在调查中我们借用了范德普尔问卷, 但为了更贴近农民的日常生活, 我们改动了某些提法, 如在第8个问题中原来提到了填税单、遗产管理表类的事情, 没有提到写信、看信类等事件, 考虑到中国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还没有接触到诸如填税单、遗产管理表之类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问题中加入了写信与看信等提示。为了检测范德普尔问题的适应性, 我们在问卷中加进了“第十一问题”, 具体的问题构成如下:

(一)假如您与您配偶有严重的矛盾而又不能和他(她)讨论, 您会同谁谈这些问题?

(二)假如您心情压抑想同某人谈谈, 您会找谁谈这些问题?

(三)假如您需要对生活中的重大变化进行咨询(如换工作、盖房子、开办企业等等), 您曾征求过谁的意见?

(四)假如您家中有些活需要别人帮忙, 如搬家具, 您会请谁帮忙?

(五)假如您患了感冒卧床不起, 您会请谁来照顾您或帮您买东西?

- (六)假如您需要借一笔钱,您会向谁借呢?
- (七)假如您需要白糖、食盐之类的东西,或要借某种工具,您会向谁借这些东西呢?
- (八)假如您在填表(如税单、帐单、看信、写信)时遇到了问题,您会找谁帮助您?
- (九)近一时期您和谁一同外出购物、散步、去餐馆、看电影?
- (十)您和谁至少每月交往一次,如喝酒、相互拜访聊天、打牌?
- (十一)如果您要办企业,或者您已经办了企业,您最愿意和谁合作或者最愿意要求谁给您帮助?

利用前述 11 个问题组成问卷,我们对福建省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跃进村是个移民村,迁来时村庄是块盐碱地。到 1980 年全村人均收入才 200 元,附近的村庄都冷眼相看,年青人找对象都是有女莫嫁跃进村。80 年代后跃进村开始大发展,到 1997 年全村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 8800 万,人均纯收入达到 8800 元,按当地村支部书记的说法这个数字只是一般数字,所谓一般数字,就是不包括大企业的收入。全村的村财 1997 年是 52 万,人平达到了 1012 元。

设计问卷时,我们要求被调查者就每个问题提出人名,如超出 5 位,就说出最重要的 5 个人名。为了有助于被调查者说真话,我们允许他们在提出人名时不用真实姓名。调查一开始,就出现了方法上的问题。按最初设计,被调查者要就每个问题首先提出人名,最多提出 5 个,可以不用真实姓名,然后再说出和他们的关系,但在调查进行中,我们发现所有人只对关系感兴趣,在回答中只答关系,而不提人名,调查对象把关系置于压倒性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处于同一关系类型中的人,无论其姓甚名谁,都没有什么差异。他们所关注的是那一类关系的地位而不是某个人的地位。属于同一类关系中人,他们往往无法以排序方式表示其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民在解决范德普尔的每个问题时所愿意寻求的社会支持是一组关系类型,每一类关系中包括了一组人,所以,如通常的西方网络分析法那样,让农民就每个问题最多提出 5 个重要人名的方法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至少在这次调查中没有得到确认。为此,我们对我们的调查目标和提问方式不得不进行适当调整,修正预先确定的要求调查对象就每个问题提出人名,以达到追溯支持网中所有人名的目的和程序,最初的目的和方法被调整为追溯关系类型,要求回答者就每个问题最多提出 5 种关系类型。

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社会是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向外扩展的亲属关系网,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所及就发生联系。亲属关系就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在这个格局里,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费孝通,1988,27、30)。家庭处于中心地位,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是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家庭关系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家庭关系向外延伸就成为社会关系如家族、姻亲,以及由于家庭之间的联姻和生育而派生出来的各种表亲关系(杨心恒,1998)等等,由于家庭在关系扩展的重要性,所以在调查时,我们以户为单位进行。

西滨镇跃进村全村有 507 人。当地对户数的计算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计生户算,所谓计生户就是夫妻只要生了一个小孩就单独算一户,无论其实际上是否离开父母单独生活,这种户的概念是为了计划生育管理的需要,是个管理上的概念。按这种口径计算,跃进村共有 130

户。一种户的概念就是根据实际,按共同的生活单位进行计算。按这个口径,全村为103户。本研究是以实际户为基础进行调查的,共调查了96户,每户调查了1人,共96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调查对象看,男性占了绝大多数。这主要是我们在调查时要求每户调查1人,这个被调查者必须是“当家理事的”。在晋江,虽然经济发展了,但男女地位还并不平等,晋江话把女人称做“在户”,男人称做“打捕”,在户就是守着家的人,打捕就是出门征战的人。从这两种称呼不难看出在晋江的男人和女人的地位。

表1 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职业构成

年龄:	频数	百分比
< 25	3	3.1
26-30	23	24.1
31-40	24	25
41-50	28	31
> 50	18	16.9
性别:		
男	78	81.3
女	18	18.8
共计	96	100.0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47	49
高中以下	40	39.6
高中以上(含高中)	9	9.4
职业分布:		
经商办企业	61	63.5
经营农业	6	6.3
兼业	5	4.1
其它:	20	20.8
缺失:	5	5.2

### 三、嵌入性、强网与弱网

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在跃进村,个人的平均网络支持规模为7.83,总体而言,在各种不同的关系类型中,朋友、兄弟姐妹关系最为重要,其次则为亲戚关系、邻里关系、夫妻关系,再次就是熟人、父子(女)及父母关系,与干部及其它人的关系居尾(表2),所以,对跃进村来说,社会结构已经和中国传统的只重视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除了重视血缘关系外,朋友这种后致性社会关系已经上升到了极其突出的位置。

这些关系和经济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人类学家波拉尼(Polanyi, K.)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问题,他针对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学者提出经济过程嵌于社会关系的命题(Polanyi, K, 1957, 249-250),其主要的意蕴是批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能用来分析前资本主义时代。格兰洛维特吸收和发展了这个概念,于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会结构与经济行动:嵌入性问题”的文章,提出经济生活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嵌于社会之网中,为社会之网所包裹(Mark Granovetter, 1985)。在他看来,经济生活嵌于社会结构之中,既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只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嵌入的程度不同(格兰洛维特, 1985)。在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如费孝通和张之毅在调查中国农村的手工业时发现,雇主和工人在发生雇佣关系之前就已经有血缘的、地缘的或种种其它关系的存在(费孝通、张之

表2 不同关系类型的重要性

关系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其它	0.64	1.13	0.00	6.00
干部	1.16	1.46	0.00	7.00
父母	2.70	2.62	0.00	10.00
小孩	2.72	2.17	0.00	10.00
熟人	2.77	2.80	0.00	10.00
妻子	3.27	1.90	0.00	9.00
邻里	3.42	2.27	0.00	11.00
亲戚	4.95	3.74	0.00	18.00
兄弟姐妹	5.43	2.91	0.00	11.00
朋友	5.89	3.24	0.00	11.00

毅, 1990, 296—299); 黄宗智根据 20 世纪人类学对长江三角洲商品和要素市场的调查指出, 新经典的有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是脱离实际的, 长江三角洲的信贷市场受互惠原则和维持生计所支配, 长工劳动力市场则为社会关系所支配(黄宗智, 1992, 105—117)。

这里我们把经济生活对于社会生活的嵌入程度称之为“嵌入系数”。嵌入系数反映了社会结构对经济生活的支持程度, 反映了村庄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 其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E = TEN / TN$$

E 代表嵌入系数, TN 代表总体网络规模, TEN 代表经济生活所嵌入的网络规模。

根据公式, 跃进村的嵌入系数计算如下:

$$E = P \text{ 的平均数与总体平均数之比} = 2.9 / 7.83 = 0.36^*$$

这个数字反映了跃进村对社会资本(由于社会关系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所以我们又把它称之为社会资本)的利用程度, 表明经济生活世界与社会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交, 但是经济生活世界并没有完全被社会生活所吞没, 既有重叠的一面, 也有独立的一面。

不同强度的社会关系对于经济生活的支持程度并不一样。那么如何去测量关系的强度呢? 这是网络力量分析中很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有的采用互惠来衡量, 有的采用交往的新近性来衡量, 有的采用是朋友、还是亲戚等等称呼来衡量, 格兰洛维特主要采用了交往的频率(格兰洛维特, 1998[1973]), 边燕杰采用的是熟识性指标(边燕杰, 1998[1997])。对于村庄来说, 由于交往空间的限制, 交往的频率或熟识性自然无法合宜地反映关系的强度, 村庄中的互惠可能带有礼仪的性质, 互惠双方既可能有强关系, 也可能有弱关系, 同样, 朋友或亲戚的称呼可能只具有名称上的意义。

在研究跃进村的关系强度时, 强度测量采用了事件介入法。就两种关系类型来说, 进入的事件越多, 其关系的强度就越强。假定有 N 个行动者, 涉及事件总数为 M, 那么, 第 K 种关系的强度为:

$$\sum_{i=1}^n \sum_{j=1}^m Z_{IJK} / N$$

本研究涉及十一项事件(也就是十一个问题), 行动者 96 人, 即 N = 96, M = 11, 对这十一项事件来说, 那一种类型的关系进入事件的数量越多, 其强度就越大。表 2 和表 3 就是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结果。表 2 包括了第十一个经济问题时各种关系的重要性, 表 3 是排除了第十一个经济问题时各种关系的重要性, 这两个表并没有重大差别, 它们都表明, 在跃进村, 朋友、兄弟姐妹和亲戚关系的强度相比之下强于其它网络, 可以归入强网名下。

表 3 各种关系的重要性(排除经济问题, 有效观察值=96)

关系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有效观察值
其它	0.64	1.13	0.00	6.00	96
干部	1.16	1.46	0.00	7.00	96
父母	2.70	2.62	0.00	10.00	96
孩子	2.72	2.17	0.00	10.00	96
熟人	2.77	2.80	0.00	10.00	96
妻子	3.27	1.90	0.00	9.00	96
邻居	3.42	2.27	0.00	11.00	96
亲戚	4.95	3.74	0.00	11.00	96
兄弟姐妹	5.43	2.91	0.00	11.00	96
朋友	5.89	3.24	0.00	11.00	96

\* 这里的 P 的平均值指的是介入第十一个问题的关系类型的平均数。

表 4 列出了各种不同的关系类型对于经济生活的意义。从表中看,在各种关系中,以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对经济生活的支持程度最大,这三者同时是人们办企业时最愿意利用的三种关系,也就是关系强度越大就越有可能被运用于企业的兴办过程。

表 4 不同关系类型对经济生活的意义

关系	配偶	父母	孩子	兄弟姐妹	其它亲属	亲戚	朋友	邻居	熟人	干部	其它
P1	4.2	9.4	9.4	40.6	1	9.4	10.4	1	0	5.2	8.3
P2	2.1	2.1	5.2	21.9	3.1	22.9	5.2	2.1	0	0	0
P3	0	0	1	5.2	7.3	8.3	27.1	4.2	3.1	1	1
P4	1	0	0	3.1	2.1	2.1	6.3	7.3	11.5	2.1	0
P5	0	0	0	1	3.1	3.1	1	2.1	8.3	1	0

注: p1、p2、p3、p4、p5 分别指介入第十一问题的每种关系类型在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与第五重要中所占百分比。

#### 四、IS—TS 解释

对跃进村的调查发现了强网的强力,对这种现象应如何进行解释呢? 格兰洛维特提出弱网的强力假说时,他对这个假说进行的解释是,在强网之中,人们相互了解,所知信息无重大差别,对于弱网来说,人们并不都知道别人知道的,从中人们可以获得新的信息、新的观念等(Mark Granovetter, 1973、1981, 25—28),我们把这个解释简称为 IS 解释,从这个模型出发,显然不能对强网的强力作出解释。后来,格兰洛维特又进一步证明,在提供非过剩的信息方面,强网比弱网具有优势,到 80 年代,他进一步发现当人们处境不安全时,强网会起作用(David, Krackhard, 1992)。边燕杰通过对 1988 年的天津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了强网的强力作用后,为了解释弱网的力量和强网的力量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他提出必须分析网络中流动的是什么,必须区分出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边燕杰, 1998[1997])。所有这些解释,都引进了一些新的变量,但这些变量都是外在于关系强度的,也就是说,关系强度和它们的关系是任意的,把它和格兰洛维特的信息模型结合起来考虑,在这个模型中可能同时找到多个解,这些解甚至可能相互矛盾。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简单的表示如图 1, 根据格兰洛维特的解释,信息与关系强度成反向关系,但是风险或影响等因素(这里一概用 S 代表)由于不能从关系强度中得到解释,所以,与关系强度的关系是任意的,这样,曲线 S 和曲线 IS 之间就可能存在多个交点。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模型,弱网和强网都可能同时发生作用,意味着弱网与强网的作用是任意的,因此,这个模型无法对网络的力量作出解释,不能对网络的作用提供预测,分析力很有限。

上述模型忽略了网络讨论中一直十分重视的信息这个变量。如果说在人们的交往中不存在机会主义、不存在道德风险,对此,信任这个因素也就没有考虑的必要性,但只要存在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分析和说明强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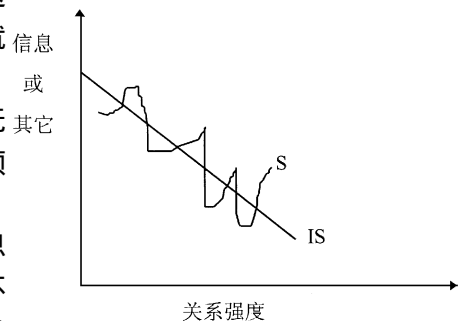


图 1

和弱网的力量就不能不考虑信任问题。在提出弱网的力量假说的同一篇文章中，格兰洛维特对于信任同样进行了讨论，而在他后来提出嵌入性问题时，对信任问题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强调 (Mark Granovetter, 1985)，但他并没有把信息模型与他所讨论的信息问题综合起来。在解释强网的力量时，以运用网络方法分析组织而闻名的学者克拉克哈特 (David, Krackhard, 1992) 就引进了信任这个变量，但他同样没有把它和信息模型结合起来，我们把这种强调信任的模型称为 TS 模型。这些研究为我们提示了综合信息和信任以解释强网的力量和弱网的力量这样相互矛盾的发现的路径，一个完整的解释模型可能需要同时考虑信息和信任问题。和前述解释不同的是，这二者都和关系强度存在一定的关系，都是内生的，一般而言，信息和关系强度成反向关系，信任和关系强度成正向关系 (詹姆斯·科尔曼, 1990[1990], 117—126)，所以，两者必定存在交点。图 2 是这两者关系的简单说明。信任与关系强度成正向关系，表示在图中就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 IS，信息与关系强度成反比，表示在图中就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 TS，根据这个模型，人们就业或办企业时会利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会利用信息曲线与信任曲线相交时所决定的关系，当信息曲线与信任曲线相交时的关系，就是最有力量的关系。我们把这种解释模型称为 IS—TS 模型。

IS—TS 模型比起前述各种模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首先它可以用来解释跨文化研究所得结论的差异。当信息分布与关系的强度不变时，网络的力量决定于信任与关系强度的关系。对于跨文化研究来说，文化的因素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同的文化传统，关系强度与信任的关系不同。信任程度高的社会，关系强度与信任的关系强度相对而言要弱些，如相当于图 2 中的  $TS'$  曲线，信任程度低的社会，这种关系就比较强，如相当于图中的 TS 曲线。很显然，TS 与 IS 相交处所表示的关系强度，强于  $TS'$  与 IS 相交处所表示的关系强度，也就是说信任程度高的社会，弱网的强力起的作用大，反之则反。如果把美国和中国社会进行比较，美国社会中具有弱关系的人之间，虽然其可信程度和强关系相比有差别，但其信任程度比起我国来说要高些，我国文化对于家庭关系或拟家庭化的朋友关系的信任程度大大高于其它关系，在弱关系中，属于低度信任国家 (Francis Fukuyama, 1995, 69—83, 269—283)。用图形来表示，对于美国社会来说，信任曲线相当于图中  $TS'$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信任曲线相当于 TS，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超出强关系的范围，相互之间的信任就急剧下降，这时人们所利用的关系类型不是强于 A' 的关系。对于美国社会来说，它还会运用强度低于 A' 之下的关系，这部分关系就是弱关系。作为一个极端的情形就是信任与关系强度无关，也就是说信任曲线相当于图中的 X 轴。格兰洛维特的信息模型 (IS) 模型就相当于这种情况，所以，可以看成是 IS—TS 模型的一个特例。

其次它可以把既有的为解释弱网的强力与强网的信任  
 强力所提出的变量如信息过剩与否、风险或不安全性等  
 因素纳入模型之中。对于信息过剩来说，其精确含义无  
 非是指关系强度对于信息分布的影响较弱，模型中就表  
 现为 IS 曲线的斜率就越少，此时它和信任曲线相交于  
 离 Y 轴更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弱网的作用会增强。至  
 于风险或不安全既可以从信息的角度进行定义，也可以  
 从信任的角度进行定义。从信息的角度看，所有的风险  
 或不安全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信息不完备状态，从而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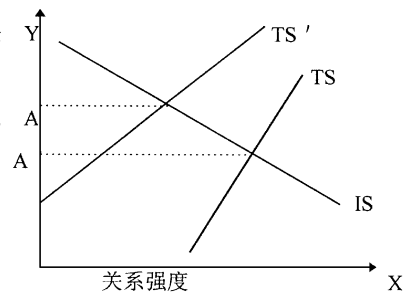


图 2

转化成信息问题进行处理。科尔曼 (James S. Coleman) 是直接把风险处理成信任问题, 他用信任一词表示准备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风险因素 (詹姆斯·科尔曼, 1990 [1990], 99)。

## 五、关于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在发现村庄中农民的社会网络类型时, 我们主要运用了范德普尔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是否适宜用于追溯农民社会网络类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问卷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范德普尔的十个问题, 第二部分为我们新加的第十一个问题, 要检测范德普尔问题的适用性, 可以通过检查去掉或加入第十一个问题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得到确定。分析的结果表明, 去掉第十一个问题有一定的影响, 但它可以解释总体方差的 98.762%, 所以, 范德普尔的问题可作为发现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适宜的工具。

在方法上, 我们除了希望发现西方网络发现法的适用性如何外, 还希望而并找出概述中国社会个人网络最佳的问题组合。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方法就是列出所有的问题组合, 建构所有的子集, 计算每个子集所提到的唯一关系类型数量, 计算总体规模可解释的方差。从表 5 看, 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可以追溯所有的关系类型。问题的最佳规模是 5 个, 最佳组合是“交往”、“填表、写信看信”、“借食盐、白糖、工具”、“搬家具”、“与配偶有矛盾”等 (见表 6)。

表 5

问题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案例
L	2.69	1.52	0.00	5.00	96
F	2.74	1.67	1.00	5.00	96
N	2.77	1.53	0.00	5.00	96
P	2.90	1.45	0.00	5.00	96
M	2.91	1.40	1.00	5.00	96
O	2.98	1.40	1.00	5.00	96
K	3.11	1.41	0.00	5.00	96
J	3.15	1.34	1.00	5.00	96
G	3.16	1.52	1.00	5.00	96
H	3.30	1.37	1.00	5.00	96
I	3.34	1.34	1.00	5.00	96
TOTAL1	7.83	1.48	4.00	10.00	96

注: F、G、H、I、J、K、L、M、N、O、P 分别代表问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TOTAL1 代表总体。

表 6

问题组合	可以解释的方差
PONMLKJIHGF	99.164
PONMLKJIHG	98.542
PONMLKJIH	96.866
PONMLKJI	96.063
ONMLKJI	95.375
ONMLKJ	94.260
NMLKJ	92.310
NLKJ	85.060
NKJ	69.489
KJ	55.382
OM	84.495
OML	87.709
OMLI	90.820
OMLIF	94.417

注: F、G、H、I、J、K、L、M、N、O、P 分别代表问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 六、简短的结论

社会网络分析在西方社会学界的地位与重要性与日俱增, 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些西方的乃至中国的学者开始运用这种方法和技术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 但这种兴起于西方的方法与技术, 如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本身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所以, 对此必须保持一定的反思自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本文立足于一个村庄展开研究, 以检验西方社会



发现社会支持网的方法和弱网的力量这个假说对于我国社会的适宜性。其基本结论是,用西方学者发现西方社会支持网的方法和程序去追溯农民的社会支持网只具有部分适宜性;弱网在城市社会之外的非就业领域的适用性并没有得到证明,调查的结果显示出强网的力量结论。但它并不构成对弱网力量的假说的根本否定,它所提示的是,在弱网与强网的作用研究过程中必须对其发生作用的文化与情景展开分析和梳理,弱网与强网的作用都应置于一动态而不是绝对的位置上。

研究弱网与强网力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现和把握网络的运作,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建立起打通微观与宏观的桥梁。弱网的强力假设提出和社会经济秩序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格兰洛维特的说法,弱网是联结不同“簇”(clusters)的桥梁,正是通过弱网社会才成为可能(Mark Granovetter, 1998[1973])。如果本文中说明的强网的强力这个结论其他地方也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说,不同的文化背景,其社会秩序的构成基础就不同,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秩序构成基础问题,中国社会秩序的构成基础就不同于美国社会,它的基础在于强网而不在于弱网,而对这种差异形成的解释,只能依赖对历史传统分析的展开。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1998[1997], “找回强关系”, 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第2期。
- 费孝通, 1988,《费孝通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费孝通、张之毅, 1990,《云南三村》, 三联出版社。
- 格兰洛维特, 1998[1973], “弱关系的力量”, 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第2期。
- 桂勇, 1997, “劳动力流动中的社会网络”,《人口》第4期。
- 郭于华, 1994, “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型流动”, 广东农民工研究分报告之二。
- 何梦笔, 1996,《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 山西经济出版社。
- 黄光国, 1989,《王者之道》, 台湾学术书局。
- 黄宗智, 1992,《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中华书局。
- 詹姆斯·科尔曼, 1990[1990],《社会理论的基础》, 邓方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培林, 1996,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李路路, 1998, “向市场过渡中的私营企业”,《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林南, 1996[1995], “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 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
- 卢汉龙, 1997,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渠道的转变”,《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赵子详、曹晓峰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 孙治本, 1995, “家族主义与现代台湾企业”,《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熊瑞梅、孙清山, 1985, “台湾制造业劳工社会网络与离职、转业行为研究”,《妇女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研讨会论文集》, 国立台湾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 熊瑞梅、孙清山、许志松, 1986, “制造业劳动工的社会连系强度与转业行为”,《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刊》第18期。
- 王思斌, 1995, “家族意识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 乔健、潘乃谷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杨国枢, 1994, “家族化历程、泛家族主义及其组织管理”(打印稿)。

- 杨心恒, 1998, “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 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袁方等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 张其仔, 1997, 《社会资本论: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社科文献出版社。
- 朱秋霞, 1998, “网络家庭与乡村私人企业的发展”, 《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Burt, Ronald S., 1982,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ction*, Academic Press.
- , 1992, *Structural Hol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Networks Society*, Blackwell Publisher.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Creation of Prosperity*, Hamish Hamilton.
- Granovetter, Mark 1981, “Toward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Income Difference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abor Markets*, edited by Ivar Berg. Academic Press.
-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November 1985).
- Knock D., Pappi, F. U., Broadbent, J., Tsujinaka, Y., 1996 *Comparing Policy Networ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ckhart, D., 1992,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 in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 edited by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G° Eccle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Montgomery, James D., 1994, “Weak Ties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an Equilibrium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Number 5, (March).
- Polanyi,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 by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Harry W. Pearson, The Free Press.
- Van de Poel, Mart, G. M.,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5. (马特°G°M°范德普尔, “个人支持网概述”, 肖鸿译, 《国外社会学》1994 年第 4 期)。
- Williamson, Oliver E., 1981,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7, No. 3(November, 198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责任编辑: 罗红光